经 济 学 漫 谈

强大货币的核心要素与打造

文 高华声

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，货币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，更是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体现。

货币的本质与历史演进

货币的诞生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。在远古时期，人们以物易物，用牛羊交换粮食，用兽皮换取工具，但这种交换方式常常因需求不对等而陷入僵局。直到有一天，先民们发现贝壳小巧便携、易于计数，且获取有一定难度，便逐渐将其作为中间媒介，这便是实物货币的雏形。从贝壳、牲畜等实物货币，到青铜铸造的刀币、布币，再到如今的电子数字形态，货币的形态不断演变，但其价值尺度、流通手段等五大职能始终贯穿其中。
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货币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。古罗马时期，罗马军团横扫欧亚非，占领的金银矿脉为帝国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。工匠们将这些贵金属精心铸造成第纳里乌斯银币，上面雕刻着威严的皇帝头像与胜利女神浮雕。凭借罗马强大的军事威慑力与繁荣的地中海贸易，第纳里乌斯银币成为当时的国际货币。从伦敦的市集到埃及的粮仓，商人们都认可它的价值。然而，到了帝国后期，为填补财政亏空，统治者偷偷减少银币的含银量，原本足值的银币变得“虚胖”。市场很快察觉到异常，物价飞涨，商人们拒绝使用贬值的货币，贸易陷入停滞，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也在经济混乱中走向衰落。

中国的货币史同样精彩。公元前 221 年，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后，面对五花八门的货币，下令“以秦币同天下之币”，推行外圆内方的“半两钱”。这种设计暗含“天圆地方”的哲学理念，更重要的是，统一的货币消除了贸易壁垒，马车拉着半两钱在新修的驰道上来回穿梭，促进了全国经济的融合。秦朝还制定了严格的货币法律，规定私自铸造货币者将受到严厉惩处，这为货币体系的稳定奠定了基础。

北宋时期，四川地区商业繁荣，但流通的铁钱笨重、不便携带。在此背景下，当地 16 户富商联合发行交子，通过统一形制推动其广泛流通。然而，富商因过度购置邸店、田产导致资金呆滞，交子兑付出现危机。同时，不法之徒私自仿冒交子，进一步引发信用崩塌。最终，官府介入，接管交子发行权，强制停止私人交子铺运营并兑换已发行交子，继而设立“交子务”，通过规定发行限额与准备金制度实现统一管理，形成早期货币监管雏形。当时的商人带着轻便的交子行走四方，不再为搬运沉重的铁钱发愁，这种创新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。

到了近代，中国货币体系受到西方列强的冲击。鸦片战争后，大量外国银元涌入中国，墨西哥鹰洋、西班牙本洋等在市场上广泛流通，严重扰乱了中国的货币秩序。为了应对这一局面，清政府开始铸造银元，如“光绪元宝”，但由于铸造技术落后、各地标准不一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直到新中国成立，才真正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。

强大货币的核心要素

货币的兴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，而强大的货币必然有着独特的核心要素。

稳定的币值是强大货币的根基。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，当时的德国央行行长威廉·福克面对政府增发货币刺激经济的压力，始终坚守货币政策的独立性。他曾在议会上拍案而起：“通货膨胀就像魔鬼，一旦放出来就再也收不回去！”正是这种坚持，让德国马克在几十年间保持着惊人的稳定性。

20 世纪 70 年代，石油危机爆发，全球货币大幅贬值，德国马克依然坚挺，甚至引得其他国家的民众争相储蓄。德国马克的稳定，背后是德国强大的制造业支撑。以汽车工业为例，大众、奔驰、宝马等品牌凭借高品质和技术创新，在全球市场占据重要份额，出口创汇能力强大，为德国马克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。同时，德国央行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，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较低水平，这种稳定的币值不仅吸引了全球资本，更让德国制造赢得了“品质可靠”的金字招牌。

在国际经济舞台上，强大的货币还需要具备广泛的国际接受度。美元的崛起便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密不可分。1944 年，44 个国家代表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，美国凭借在二战期间积累的压倒性经济实力——其黄金储备占全球总量的 75%，主导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。该体系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（35 美元兑换 1 盎司黄金），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，实行固定汇率制度。

从此，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的“霸主”，全球约 88% 的外汇交易都离不开美元。在中东的石油市场，一桶原油的价格永远用美元标注，这种广泛的接受度赋予美国巨大的经济特权。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向全球征收“铸币税”，并利用货币政策的调整，影响甚至收割全球经济。例如，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，美国实施多轮量化宽松政策，大量增发美元。这些新增的美元流入全球市场，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，其他国家不得不承受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。而当美国经济复苏，开始加息缩表时，全球资本又大量回流美国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遭遇货币贬值、股市暴跌的危机。

在确保币值稳定和获得国际市场认可的基础上，是否仅凭货币的强大实力就已足够？显然，答案是否定的。一个健全的货币发行与监管体系同样至关重要。回顾历史，货币体系的崩溃往往与监管机制的缺失紧密相关。我国在货币体系建设方面展现了卓越的智慧。面对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，中国人民银行迅速采取行动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，精准地控制了货币供应量。与此同时，我国还构建了一个跨部门的金融监管网络，形成了严密的金融监管体系。

近年来，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，监管难度不断加大。为了应对这一挑战，我国积极探索创新监管方式，如建立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机制，在可控范围内对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进行测试，既鼓励创新，又防范风险。

强大货币的重要意义

强大的货币对国内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。20 世纪 90 年代，日元国际化进程加速，日本企业拿着日元在全球疯狂投资，收购美国的洛克菲勒中心、哥伦比亚影业，甚至喊出“买下整个美国”的豪言。虽然这种扩张后来因泡沫破裂而受挫，但也从侧面证明，强大的货币能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，拓展国际市场。

我国人民币近年来在跨境贸易中的广泛使用，同样让国内企业受益。一家浙江的纺织企业，以前用美元结算，每笔订单都要承担汇率波动风险，改用人民币结算后，财务成本大幅降低，企业得以将更多资金投入技术研发，产品远销海外。人民币国际化还能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发展。随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接受度提高，越来越多的

国际投资者希望参与中国金融市场，这促使我国加快金融市场改革，完善市场制度，提升市场透明度和规范性。

在国际竞争中，货币的国际地位直接影响国家话语权。如今，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战略价值，它不仅是我国经济实力提升的体现，更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抓手。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（SDR）中的权重不断提升，从 2016 年的 10.92% 提高到 2022 年的 12.28%，意味着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。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中，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，让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更加紧密，推动我国企业在国际工程、贸易中掌握更多主动权，极大提升了国际竞争力。

强大的货币还有一个关键意义，那就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。从历次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到，强大的货币是抵御风险的坚固盾牌。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，我国由于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，且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，成功抵御了危机冲击。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表现，不仅稳定了国内经济，还为周边国家提供了信心支撑。

我国货币体系的发展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经济形势严峻，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是一个通货膨胀的“烂摊子”。1949 年，上海街头的米价一天能涨好几轮，百姓提着成捆的金圆券去买米，结果钱比米还重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果断出手，一方面调集粮食、棉纱等物资，投放市场，平抑物价；另一方面，1955 年发行第二套人民币，以 1:10000 的比例回收旧币，彻底稳定了货币体系。

在稳定货币体系的基础上，我国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货币制度。计划经济时期，人民币主要服务于国家计划经济体制，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和固定汇率制度。这种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保障了国家经济建设的资金需求，促进了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。

改革开放后，货币体系迎来新变革。1984 年，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为中央银行，开始行使制定货币政策的职能。据当时的银行工作人员回忆，以前银行就像“国家的大会计室”，而改革后，央行要像“经济的调音师”一样，通过调整利率、准备金率等手段调节经济。人民币汇率制度也在不断探索，从最初的固定汇率，到后来引入市场机制，走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。

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，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，虽然承受了巨大压力，但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，也为人民币赢得了国际声誉。此后，我国继续推进货币体系改革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，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悄然启动。

在时代的浪潮中，我国货币体系紧跟步伐，不断创新。

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是一大亮点。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，当地商人用人民币购买中国的工程机械；在俄罗斯的远东市场，中国游客可以直接用人民币购物。这些场景背后，是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。2015 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（CIPS）上线，就像搭建了一条全球人民币流通的“高速公路”。曾经，一笔跨境人民币汇款可能需要好几天，现在通过 CIPS 系统，几分钟就能到账。

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，截至 2025 年一季度末，IMF 公布的外汇储备币种构成调查（COFER）报送国持有的人民币储备规模为 2463 亿美元。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减少了我国企业对美元结算的依赖，降低了汇率风险，还能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发展，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。例如，我国债券市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，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资者，截至 2025 年 4 月，境外机构持有中国债券规模为 4.5 万亿元。

我国在数字货币领域的探索同样引人注目。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堪称一场“未来货币革命”。在苏州，一些市民曾收到数字人民币红包，用手机轻轻“碰一碰”就能完成支付；在冬奥会赛场，外国运动员拿着数字人民币钱包，惊叹于中国支付的便捷与安全。

数字人民币不仅提升了支付效率，还能实现“双离线支付”，即使在没有网络的深山里，两部手机“碰一碰”也能完成交易。更重要的是，数字人民币的发行采用双层运营体系，既保留了传统货币的特性，又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了可追溯性，能有效防范洗钱等金融犯罪。目前，数字人民币试点已覆盖全国多个城市，应用场景不断拓展，涵盖零售消费、交通出行、政务服务等领域。数字人民币的发展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机遇，有望在全球数

字货币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。

无论是人民币国际化，还是数字货币发展，都离不开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的创新支持。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，我国在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方面也持续创新。中期借贷便利（MLF）、常备借贷便利（SLF）等工具就像“精准滴灌”的水龙头，将资金引向小微企业、绿色产业等重点领域。2020 年疫情期间，央行通过这些创新工具，为企业提供低成本资金，帮助无数企业渡过难关。

同时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紧密配合，当政府发行专项债券时，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稳定利率，形成政策合力，为经济稳定增长保驾护航。此外，我国还积极探索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，如碳减排支持工具、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等，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倾斜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打造强大货币的未来探索

尽管我国在货币领域成绩斐然，但前方依然挑战重重。在国际上，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，多次通过量化宽松政策“收割”全球财富。每当美联储宣布加息或降息，全球金融市场都会“抖三抖”，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往往首当其冲。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已经瓦解，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涉及各国利益博弈，推进困难重重。

从国内来看，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平衡仍是难题。随着互联网金融、虚拟货币等新业态涌现，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监管漏洞进行非法集资、诈骗，威胁金融安全。同时，我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，如债券市场的规模、衍生品市场的成熟度都有待提升。我国债券市场以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为主，企业债和公司债占比较低，且债券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不够多元化，这些都制约了金融市场的发展。

挑战与机遇并存，我们需要以战略眼光谋划破局之道，扎实推进货币体系建设，迈向金融强国。

首先，持续深化金融改革，夯实货币体系根基。在利率市场化方面，推动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，让市场在资金定价中发挥决定性作用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。同时，健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，增强汇率弹性，建立“双向波动、底线管理”的市场化调节机制，避免汇率大起大落。在金融市场建设上，大力发展企业债、绿色债券等债券品种，完善衍生品市场规则，吸引更多长期资金入市，提升金融市场的深度和韧性。

其次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，突破国际货币体系困境。以共建“一带一路”为契机，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货币合作，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、投资中的使用。重点拓展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定价中的影响力——2023 年，我国与巴西达成协议，以人民币结算双边贸易中的大豆、铁矿石等商品，打破了美元垄断大宗商品定价的局面。同时，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，扩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（CIPS）的覆盖范围，提升其服务能力。此外，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，推动 IMF 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，提升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，为人民币争取更多国际规则制定权。

再次，强化金融科技应用，抢占货币创新制高点。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技术为货币体系注入新动能。利用大数据分析，央行可以实时监测货币流通速度、资金流向，精准制定货币政策——例如，通过区块链技术搭建的“货币流通监测平台”，能将资金流向的追踪效率提升 90%，有效防范资金挪用风险。在数字货币领域，持续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试点，拓展应用场景，除零售支付外，探索数字人民币在跨境贸易、政府债券发行等领域的应用。同时，加强金融科技监管，建立“监管沙盒”机制，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风险底线，确保数字人民币等创新成果服务于国家战略。

最后，加强党建引领与人才培养，筑牢发展保障。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，是金融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。在金融领域加强党建工作，将党的领导融入货币发行、政策制定、风险防控等各个环节，确保货币政策始终服务于人民利益和国家战略。同时，培养造就一支既懂金融又讲政治的高素质人才队伍——通过高校设立“金融科技”“人民币国际化”等交叉学科，联合金融机构开展实战化培训，培养一批熟悉国际金融规则、具备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，为打造强大货币、建设金融强国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。（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党总支副书记、科研副院长）